

陶奭龄著述考论*

刘泽亮 田 希

摘要 陶奭龄是明末佛学与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学界至今对其著述仍缺乏系统性的梳理,这与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根据传统史料并结合新发现的《宗镜录具体》,全面爬梳、考论其著述的全貌,为拼接陶氏完整的思想文本谱系奠立学术基础,以廓清笼罩在这一被埋没的思想家身上的迷雾。

关键词 陶奭龄 以禅证儒 儒佛会通 宗镜录具体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9)05-0134-09

作者: 刘泽亮,男,1964年生,湖北天门人,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佛学、儒佛会通。福建 厦门 361005; 田希,男,1986年生,湖北蕲春人,厦门大学哲学系2014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佛学、儒佛会通。福建 厦门 361005

陶奭龄在明末佛学与儒学开展过程中曾经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但长期以来,其著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审慎的梳理,不仅与其在中国佛学史、儒学史以及儒佛会通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其思想以及明末思想界新的发展走向的整体观照与全面理解。本文拟根据传统史料,并结合新发现的《宗镜录具体》,系统董理、还原其著述的全貌,为其思想个案的深入研究奠立基础性的文本谱系,以廓清笼罩在这一被埋没的思想家身上的迷雾。

一、陶奭龄及时人对其的评论

陶奭龄^①(1571—1640),字君奭,号石梁,又号小柴桑老,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世寿七十。民国重印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四《理学》有传云:

陶奭龄,字君奭,号石梁,承学第四子。生而近道,持身制行,不规而圆,不矩而方。为文学日,即主张正学。……万历癸卯举于乡,授吴宁学博,俗甚浇,作《正俗训》,上台使行之,风为之易。迁肇庆推官,辨诬盗,释冤狱,人颂为神明。……晋济宁守,……驰归不起,作《圣训六条解》,召宗人训之。……著有《迂改格》、《喃喃录》、《今是堂集》。……私谥曰“文觉”。^②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发现《宗镜录具体》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BZJ013)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其生卒年的考证,参见何冠彪《陶望龄、奭龄兄弟生卒考略》,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

② 董钦德《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四,《人物志·理学》二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08—509页。

由此可知,其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中举,曾任吴宁学博、肇庆推官、济宁守等职。

从刘宗周“如词林鲁公元宠举同乡原任肇庆府推官司升济宁州,未任致仕”^①之语,可见陶奭龄并未就任济宁守一职,而是致仕归隐。根据《小柴桑喃喃录》叙其“老而休”居乡里,以“凡身所经尝,与夫耳目所闻见,及阅古而有获者,即拈以相示”,“以训子姓”^②,可知其晚年乡居,以教子姓为务。

陶氏一生,在思想史上以讲学著称。其及门弟子,有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等。据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传其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辈。”^③说的是其学术传人,“辈”乃“等”之意。另据姚名达所记,“宗旨既不合,诸生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等遂独奉奭龄为师模,纠集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④说的则是陶奭龄与刘宗周因本体与工夫等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在证人社之外另立白马别会,以及二人弟子分道扬镳的情形。

陶奭龄与其兄陶望龄^⑤(1562—1609)二人,同宗王守仁之学,分别为阳明学的三传和二传,时称“二陶”,在明清之际士林之中享有盛名。

与其同时代并过从甚密、学术立场不同的刘宗周,曾盛赞“二陶”极尽溢美之词:

盖会稽有陶氏两先生云,文简公著名馆阁,为一代宗工,所著《歇庵集》行于世久矣;弟石梁先生,吏隐州郡间,声光逊文简,而懋实埒之,识者以拟正叔之于伯淳。^⑥

这里提到的正叔,即程颐;伯淳,即程颢。刘宗周将陶氏兄弟拟作二程,言陶奭龄虽“声光逊文简”,而其盛大之象,实与陶望龄不相上下。陶奭龄作为其胞兄学术观念的承继者,所谓“声光”略逊,暗指其官阶不高,知名度不大。“懋实埒之”,则指其学术水准与理论素养与其兄旗鼓相当。在《祭陶石梁先生文》中,刘宗周认为陶奭龄的理论贡献,丝毫不逊于其兄陶望龄:

独抱文简(陶石笈,即乃兄陶望龄——引者注)未竟之业,精推而潜伏之。……一时云合景从,奉先生如海门往祀。而先生尤以贞素之风,一洗自来空谈之弊。^⑦

此外,刘宗周还亲作《荐陶奭龄公揭》,向朝廷举荐其出山参与政事,“轻则加衔六馆,重则正席成均”称其为“当世第一流人物”、“理学真品”:

陶奭龄者,殆当世第一流人物也。本官司清真简介,生而有近道之资,少与其兄文简

① 刘宗周《荐陶奭龄公揭》,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四册《文编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② 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自序,明吴宁李为芝崇祯乙亥(1635年)刻本。

③ 全祖望《碑铭六·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鮑琦亭集内编》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④ 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九册《附录》,第346页。

⑤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笈,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被诏为国子监祭酒。一生清真恬淡,以“歇庵”名其居室,学人时称“歇庵先生”。与焦竑、袁宏道等论学。生平笃信王守仁之学,曾师从周汝登(海门),与陶奭龄等以讲学名天下。晚年参云栖株宏,受菩萨戒。工诗善文,著有《解庄》12卷、《天水阁集》13卷、《歇庵集》20卷、《宗镜广删》等,并刻印过范梈《洗心居雅言集》2卷,徐渭《徐文长三集》29卷。万历三十九年(1611),其后人刻印过他的遗作《陶文简公文集》13卷。关于其生平,民国重印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四《理学》有传。

⑥ 刘宗周《今是堂集序》,载陶奭龄《赐曲园今是堂集》,明崇祯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0册,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又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卷本)卷五,第548页,标题为“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

⑦ 刘宗周《祭陶石梁先生文》,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六册,《文编》下,第776页。

公厉志讲王文成之学,至不惮旁参密证,以求向上一路,人称二难。限于一第,自广文历司李,所至以其学显;而清标惠政,疏冤理枉,尤著粤东,上下交口颂之。量移济宁,飘然投牒林居六、七载,乡闲奉为彥方、尧夫。日是以士子商求性命,得之者无不人人如醍醐灌顶,因而北面日众,远近响应,文成学脉遂得丕振于东越。夫本官既绝意仕进,亢席师模,不愧为理学真品。^①

陶奭龄一生深受其兄思想的影响,在陶望龄四十七岁抱病早卒之后,他继承乃兄的“未竟之业”,“精推”“潜伏”,卓有成就,一时间“云合景从”,影响甚大。海门,即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别号海门。陶奭龄从思想脉络而言,正是承袭周海门一脉以禅证儒的道统而来。“奉先生如海门往祀”,是说其影响力与前辈先贤周汝登不相伯仲。这类话,出自陶奭龄生前与死后刘宗周所作的荐文与祭文,出于为尊者颂、为尊者讳的动因,对其褒奖有加而不言其过,本是情理中事,因此,似乎不能作为评判的唯一依据。

然而,凑巧的是,周汝登在《与陶太史石簣及石梁文学》的书信中,也对其不吝褒奖:

阳明书院之会,望二丈俨然临之,越中一脉,难令断绝。^②

周氏预言阳明的学脉道统仰赖“二陶”而能不辍,虽然其中也许夹杂着寄望“二陶”为往圣继绝学的殷切期盼之意^③,但这种评价,绝不宜视为空穴来风,而是与其在晚明时期的理论创造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

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时人及后人一般都站在儒家“纯正”道统的角度,关注其“杂于禅”之非,充斥着对其杂禅的责难。学界最常引用的是刘宗周的一段话:

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④

刘宗周之子刘洵所作《蕺山刘子年谱》亦称:

按越中自阳明先生倡学后,其门人最著者为王龙溪,由龙溪而传及周海门,海门同时为陶石簣,俱本良知为宗,而递衍递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尝从事于斯而有得。^⑤

此外,还有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

越中承海门周氏之余绪,援儒入释,石梁陶氏奭龄为之魁。……姚江之绪,至是大坏,忠介忧之,未有以为计也。^⑥

但是,对其理论创造,以及为何、如何、依何“杂于禅”“而有得”,并“为之魁”,一直缺乏跳出传统儒家立场的严谨、审慎的学术讨论,这与其著述的相关记载扑朔迷离有关,也与学界对其著述及

① 刘宗周《荐陶奭龄公揭》,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四册《文编上》,第261—262页。

② 周汝登《与陶太史石簣及石梁文学》,见《周海门先生文集》卷之十,载张梦新、张卫中点校《周汝登集》(全三册)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页。

③ 参见周汝登《与陶石梁》:“愿丈出而振作此会,为后来人作前导,为吾道计无穷,方为大善知识之运用也。燕昭不惜黄金以市死马,越王见怒蛙而式以其有气。谋国尚然,况为道谋哉!”载张梦新、张卫中点校《周汝登集》(全三册)上册,第267页。

④ 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十册《附录》,第485页。又见《明史》卷255《刘宗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91页。

⑤ 刘洵《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全十册)第九册《附录上》,第99页。又见(明)董瑒编:《刘子全书》卷四十“崇祯五年壬申条”;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二十九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201页。

⑥ 全祖望《碑铭六·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鮑琦亭集内编》卷十一,第214—215页。

思想文本的系统性梳理不够有关。

二、陶爽龄的诗文与思想著述

明确体现陶爽龄思想的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归纳为集中性的直接著录、师友片断性的零星文本、佛教藏经及史料中的相关资料等几类,以下对此逐一加以考述。

一是直接、集中且众所周知的陶爽龄著述文本。

主要有三种《小柴桑喃喃录》、《赐曲园今是堂集》、《先兄周望先生行略》。

第一种,《小柴桑喃喃录》二卷,现存明吴宁李为芝崇祯乙亥(1635)刻本。据其《自序》所述:

《小柴桑喃喃录》者,柴桑老人录,所以训子姓之言也。既以老而休居,日与子姓聚,语凡身所经尝,与夫耳目所闻见,及阅古而有获者,即拈以相示。既相示已,随而录之,故语无伦次,重复郑重,喃喃焉似老人之言,故曰《喃喃录》也。

可知该书为其晚年致仕归隐乡居,以“凡身所经尝,与夫耳目所闻见,及阅古而有获者”“拈以相示”、“以训子姓”的结集,全书约两万八千字。现代著名剧作家、文艺批评家阿英(1900—1977)偶见此书,感慨系之,在《明人笔记小话》的第一则,即为《喃喃录》:

《喃喃录》系爽龄晚年之作,收随笔三百八十四则。所谈以做人为主,旁及文学、政事、人物、花鸟,谈佛者亦不少。书前自序一,将其晚年情怀,作书原旨,尽情吐露,为一篇绝妙之抒情文字。《四库》不收爽龄书,既遭焚毁,不知尚有几部留存人间?^①

并慨叹“始知爽龄在文学方面之素养与成就,有超出曩口假定之上者”。正如作为文学家的阿英所见其文学“素养与成就”一样,若揆之以哲学的视角,该书是了解其哲学思想旨要的重要文本资料。

第二种,《赐曲园今是堂集》,简称《今是堂集》,十一卷,现存明崇祯刻本,载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0册,为陶爽龄所作的诗文集。其中,卷一至卷十为诗,卷十一为词,卷首有刘宗周所作的《今是堂集序》(《刘宗周全集》题为《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主要是与亲朋道友之间的唱和,其中大半涉及与佛教僧侣的交往,以及有关素食、放生等佛教的义理,是研究陶爽龄生平交游、思想历程的可靠材料。

第三种,《先兄周望先生行略》,是陶爽龄在陶望龄歿后为其兄所作的生平传记。“先生生嘉靖壬戌(1562年——引者注)七月二十三日,卒于万历己酉(1609年——引者注)六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八,通籍者二十一年,三以告归,里居共十五年,立朝者才六年耳。”^②简略地记述了陶望龄的一生。该文作为附录,载于《歇庵集》。

《歇庵集》,二十卷,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365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署明陶望龄撰《附录》三卷、署明陶爽龄等撰《行略》。《行略》一文,载于《续修四库全书》《附录》一第652—659页。

^① 阿英《明人笔记小话》载《阿英全集》第六卷《杂文(1936年—1954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② 陶爽龄《歇庵集》附录一《行略》,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365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95页。

此外,前述康熙《会稽县志》云其另著有《迁改格》,但据姚名达《刘宗周年谱》所述:

秦弘祐著《迁改格》,善过对举,一理性情,二教伦纪,三教育局流俗,四广利济。陶爽龄序而行之。^①

据此,则该书乃为秦弘祐执笔,只不过由陶爽龄“序而行之”而已。揣其题名,应为迁过改新之意,类似于功过格之类的作品^②。

二是散见于师友著录中片断性的陶爽龄零星文本。

据前述康熙《会稽县志》载,陶爽龄曾有《语录》流世。“门人王朝式、秦弘祐、徐廷玠等辑为《语录》。”^③遗憾的是,今或不存;不过,在部分师友的著述之中,仍然间接保存了部分陶爽龄相关的思想文献资料,其中,以吴光主编的《刘宗周全集》(有六册本、十册本)存留的为最多。依十册本,除第四会、第六会、第七会(“陶先生亦不赴席”)、第十一会未见记录之外,其零星的思想,集中反映在第三册《语类》十四、十五之中。主要有:

《语类十四·会录(附易箴语)》中:有一段约120余字(第458页);有秦弘祐引“陶先生”言本体与工夫一段和陶爽龄的两段共计50余字片断语录(第459页)均涉及其对本体与工夫的具体论述;刘宗周与陶爽龄两人关于“从喜怒哀乐上做工夫”、何为良知、迁改工夫的发用、看心之方等四段互动(第460—462页)。

《语类十五·证人社语录》中《题辞》载有为证人社“互发其旨”、“纪录成帙、遂付之梓”、署“崇禎壬申八月望 柴桑退叟陶爽龄题”所写的一段总结性文字(第三册《语类》,第496页)。刘宗周记第一会中载有两段“石翁曰”(第498页)。章明德记第二会记有“陶先生曰”五段,并附有《陶石梁先生语录》,载“四月初三日,会中讲《素位》章”的语录(第499—500页)。祁骏佳记第三会后附有署“陶石梁先生撰”的《又“时习”章讲意》(第504—506页)。第五会有刘宗周记“石翁曰”四则与周懋宗记“陶先生曰”两则(第509—511页),后附《陶先生与刘先生书》一通(第512页)。王光瀛记第八会中有陶爽龄讲“克己”章义(第518页、519页)。邵邦宁记第九会中有陶爽龄讲《系辞》一段(第519页)，“陶先生述”《知生说》一篇(第523—524页)。章明德记第十会中有陶爽龄讲“居敬穷理”(第525—526页)。

这些记载,主要保存了刘、陶二人主持“证人社”这一段时期有关陶爽龄思想的原始记录,是研究陶爽龄思想以及刘、陶二人思想歧异的重要文本资料。

三是因拘于儒家门户成见而鲜加注意的佛门藏经及史料等文献资料。

主要有四种《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塔铭》,《永明道迹》、《吴都法乘》中两则片断,以及校阅《天乐鸣空集》。

第一种,《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塔铭》,陶爽龄撰,载明凡录,丁元公、祁骏佳编《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卷八,《叵新续藏》第72册, No. 1444。主要记述湛然圆澄(散木道人)一生的生平事迹、出家

① 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九册,第356页。

② 按吴震所说,当时有两种迁善改过的指导书,此为其中之一:“一部是石梁一派非常推崇的,由秦弘祐执笔的《迁改格》,在‘社’内推广;一部是蕺山所作的《人谱》,既是‘专为改过而作’(梨州语),又是专门针对石梁一派的《迁改格》而发。”从这个意义而言,虽然该书可能代表了陶爽龄的思想或立场,但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出现之前,与其说该书为陶爽龄所作,不若视其为代表陶爽龄一派的著述可能更为恰切、允当。参见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③ 董钦德《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四,《人物志·理学》二一,第509页。

悟道、讲法著录、及门弟子等,叙述圆澄与其兄陶望龄的交谊、与家族之间的渊源,并交代了撰作该铭的缘起,乃因“其弟子明怀谱师遗事,请铭于爽龄。”“透明方继主天华法席,明雪分化弁山,复以塔铭为请。因以平昔所闻,考诸年谱,叙而铭之。”^①是了解陶爽龄的生平以及与圆澄、明怀、明方、明雪师徒交游的重要资料。

第二种,《永明道迹》中的片断资料。明代重编的《永明道迹》中,包括了由永明延寿“身为善继禅师”所引发的陶爽龄与云栖株宏禅师的一段问对:

陶爽龄曰“愚谓禅师脱颡娑婆,栖神瞻养藏轮,诸传记凿凿可征也。何犹然决策名场,而游心仙籍,为厌彼极乐,复为人间之劳乎!登上品者为有退转乎,为师中无实证乎?”

云栖大师曰“师之行道,普贤亲授以妙莲。师之既化,縻魔躬瞻乎宝相,实证之果无疑。似退之,益硕大。使果极释迦,不妨百界之分身,记获弥陀,正好大慈之填。愿劝。”^②

《永明道迹》,宋大壑辑,明六梦居士虞淳熙、寓庸居士黄汝亨校阅,收入《卮新续藏》第86册 No. 1599。校阅者虞淳熙(1553—1621),字长孺;黄汝亨(1558—1626),字贞父,均为浙江钱塘人。卷首有歇庵居士陶望龄于万历丁未(1607)首夏望日“书于会稽法华山天衣精舍”的《永明道迹序》。该书中所记的这一段出自儒士与僧侣之间有关永明延寿后世转世为善继禅师传说的问对,涉及到作为儒生的陶爽龄对佛教悲智观、三身观的疑问与作为僧侣的株宏对其疑问的回应,真实地记载了陶爽龄深化理解佛教思想的心路历程,是研究陶爽龄以禅证儒、儒佛会通思想的一则值得注意的资料。

第三种,《吴都法乘》中的部分资料。载于《吴都法乘》的《弗杀众骇其事咸赋诗纪之》,其中有一段事关陶爽龄与张芝亭亲历佛家因果报应事迹的记载:

万历辛卯(1591年——引者注)夏,会稽陶石梁、张芝亭同寓大善寺,见鳝鱼数万,陶谓张曰“予欲买放生,奈力弱,兄为倡,募众成之,何如?”张曰“诺。”遂先出银一两,众凑成八两,绕城放之。至秋,陶梦人云“汝未该中,缘放生功大,得早一科。”后于榜果有名。且曰“尔时我虽发心,实赖芝亭之力,奈何独归功于我?”数日后,南京录至,张亦中式。^③

此外,据东海止庵王起隆撰《天乐鸣空集缘起》载,陶爽龄曾“校阅”并“订正”过《天乐鸣空集》^④。《天乐鸣空集》三卷,明鲍宗肇^⑤述。所可注意者,《天乐鸣空集》卷中《谤宗镜录》,言“神昏欲强、智浅不思”之人,“指《宗镜》为义学,斥永明为小乘,多见其不知量也”^⑥;卷下《儒释文理各别执》,言“儒释文理,其间旨趣,或深浅不同,而谓文理各别,是大不然。”^⑦前者是对永明延寿《宗镜录》误解的反驳,后者是对佛、释文理各别之执的破斥,且卷中开篇《事理融通,乘戒兼急》,也暗合永明延寿一贯的思想主张。另据与陶爽龄同阅《天乐鸣空集》的王起隆所述:

① 明凡录,丁元公、祁骏佳编《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卷八,《卮新续藏》第72册 No. 1444,第840页下。

② 大壑辑,六梦居士虞淳熙、寓庸居士黄汝亨同校阅《永明道迹》,《卮新续藏》第86册 No. 1599,第59页中。

③ 周永年《吴都法乘》卷二十四,《大藏经补编》第34册 No. 0193,第77页中。

④ 参见鲍宗肇述,智旭定《天乐鸣空集》卷上,《嘉兴藏》第20册 No. B097,第471页上。

⑤ 鲍宗肇,字性泉,绍兴山阴人。尝从紫柏真可、湛然圆澄等游,晚而皈依云栖株宏,笃志净业,兼肆力于《方山合论》、永明《宗镜录》诸书,自号“天鼓居士”。

⑥ 鲍宗肇述、蕩益智旭定,陶爽龄、王起隆阅《天乐鸣空集》卷中,《嘉兴藏》第20册 No. B097,第487页上15—17。

⑦ 鲍宗肇述、蕩益智旭定,陶爽龄、王起隆阅《天乐鸣空集》卷中,第494页上26—27。

(鲍性泉——引者注)所著有《胜方便金刚略解》,《涂毒鼓声》,《天乐鸣空集》,俱未行世。性泉自记《涂毒鼓声》,尚留会稽陶石梁先生家未还,惟此一书(指《天乐鸣空集》——引者注)为石梁先生订正。^①

可见,陶奭龄除了校阅、订正《天乐鸣空集》之外,还曾阅读过鲍性泉所著《涂毒鼓声》一书。这些线索,是进一步深化理解陶奭龄思想倾向以及研究其删述《宗镜录》动因的重要参考资料。

以上相关陶奭龄直接完整的著述与零星片断的资料,是目前能够拼接出的反映陶奭龄思想最为直接的文献。其中,校阅佛教著述,或许也是其删述《宗镜录》的前序工作之一。

三、新发现的《宗镜录具体》

陶奭龄《宗镜录具体》,二十四卷。

关于该书的明确记载,见于明净挺所辑的《学佛考训》:

陶石梁,会稽人,参散木和尚(即湛然圆澄——引者注)辑《宗镜具体》行于世,著《喃喃录》。^②

但学界一直将其列入佚书,未见真容。在系统梳理永明延寿《宗镜录》抄撮源流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这本久佚的文献,查到该书现藏于日本驹泽大学,通过友人的帮助复制到该书,并做了初步的点校与整理,方得以一窥其全貌。

据书前《缘起》及后《跋》所述,该书经陶氏二十余年精心董理,“原稿共三十三卷,兹并为二十四卷。”^③“诸友因有请拈提要,以惠后学者,先生许之,几阅两岁,再易稿,而始比名之曰《宗镜录具体》。”^④

史孝复受陶氏之请“订正较讎”,仅出版数卷,陶氏即歿。校订者史孝复,曾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与其兄史孝咸(1582—1659)等成立“半霖义学”(“姚江书院”前身),传授王守仁“良知”之说。

该书卷首依次载有:命名为《宗镜录题》、分别出自宋代觉范惠洪(1071—1128)及元代中峰明本(1263—1323)的两则论述《宗镜录》的摘要,史孝复于1640年所撰的《缘起》,陶奭龄厘定的《总目》《凡例》(二十二条),史孝复搜集整理的《附录》(载有陶奭龄《刻冥枢会要》跋文以及包括《与诸友书》《与李丹仲书》《答史子复》在内的五通信札)。书后有《跋》,惜乎原版残缺,约三分之一字迹漫漶阙如。

根据黄汝亨的记载,陶奭龄手定《宗镜录具体》,始于1637年,成于1638年,之后委托黄氏加以订正较讎:

先生手定是书,始于丁丑(1637年——引者注)仲春,而竣于戊寅(1638年——引者注)之孟秋。^⑤

丁丑(1637年——引者注)春,馆穀陈纪常氏获侍教于石梁先生,偶及此书,辄叹赏不

① 鲍宗肇述、溇益智旭定,陶奭龄、王起隆阅《天乐鸣空集》卷上,第471页上23—26。

② 钱唐浪亭和尚净挺辑、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订:《学佛考训》卷七《儒流》,《嘉兴藏》第34册, No. B295,第19页中。

③⑤ 史孝复《宗镜录具体》凡例。

④ 史孝复《宗镜录具体》缘起。

容口^①。

几阅两岁,再易稿,而始比名之曰《宗镜录具体》。复奉订正较讎之命。^②

丁丑(1637)、戊寅(1638)之年,陶爽龄已届六十七、八岁,距其离世不足三年。

是书刊刻的当年,陶氏即卒。据“崇祯庚辰(1640年)仲春余姚退修居士史孝复”所作的《〈宗镜录具体〉缘起》称:

所可惜者,剞劂未毕,而先生去世,未获亲睹其成,且不及数语弁端,以发挥其妙,为有遗憾耳。^③

该书的底本,根据与《宗镜录》诸版本的初步比对,应为径山本《宗镜录》,这或许与当时《径山藏》的印制刊刻及大量流通所提供的方便有关。

根据初步比对的结果,《宗镜录》原文(不含序跋标点)计约78万字,《宗镜录具体》原文(不含序跋标点)约44万字,在《宗镜录》的各种略本中,为篇幅之最。其中,删减《宗镜录》原文约34万字,删除比率达43%。又,改动200余处,删除近3000处,眉批347处。除此之外,新增近6000字,具体有《宗镜录题》、《宗镜录缘起》、《宗镜录具体总目》、《宗镜录具体凡例》以及史孝复搜集整理的《附录》。

该书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其一,作为“具”《宗镜录》之“体”的抄撮性著述,该书对于系统把握《宗镜录》的宗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书“芟其繁复”之文,“掇其精粹”特别突显“紧要问答”,对流通本“每遇更端征问处,必另分一段,其答语则空一字,俾览者一披问语,则大旨了然”;于录中“引用故实者”“兹用小字分注其下,庶令本文简洁,易于研览”,“凡有名相处俱有标志”“以醒学人眼目”;尤为可贵的是,“其经论等已毕,而下系永明语者,俱用短画界断”,也就是将延寿引证经论的语言与延寿本人的阐述进行了清晰的区分。此外,还间有陶氏的批注。经过陶氏的精心剪裁,“或芟数行而意弥精,或抹一言而旨益显。譬临淮御军,号令一施,壁垒旌旗,翕然一变,觉全录之精神至此益焕,而唯心之旨倍为昭著。”^④使《宗镜录》的精义更加显豁,为系统理解《宗镜录》以及永明延寿思想、延寿《宗镜录》在明清之际的演变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可资进一步研究的个案资料。

其二,作为阳明后学以禅证儒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对于全面把握陶爽龄思想及其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陶爽龄曾被同时代的儒家学者斥为“杂于禅”而“失其旨”,这或许也是《四库》之类官方丛书“不收”其著述且横加“焚毁”的原因。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儒学道统门户之见的偏颇,而是站在超越传统儒学所谓正统窠臼的中立学术立场而言,这类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指责与非难,实在不足为据。但随着时间的迁延与《宗镜录具体》文本资料的缺失,目前学界对其为何、依何、如何杂于禅,一直晦而不明。该书的发现,作为陶爽龄晚年佛学著述的完整呈现,为全面研究其哲学思想、廓清笼罩在其思想上的迷雾,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资料。通过对该书文本结构的梳理、与《宗镜录》的比较研究以及陶氏所作的眉批,在为把握《宗镜录》的思想主旨提供重要参照的同时,也凸显出陶爽龄所作的理论创造,成为研究陶爽龄以禅证儒思想动因、理论依据及其历史贡献的直接文献与理论标本。

①②③ 史孝复《宗镜录具体》缘起。

④ 此段引文,均出自史孝复《宗镜录具体》缘起。

同时,如果将其置于晚明佛学与儒学演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还会发现,《宗镜录具体》作为晚明佛学综合复兴特定时空环境下孕育的作品,为考察其在《宗镜录》抄撮、宋以后佛教流变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晚明佛教集中体现的走向,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与研究线索;通过陶奭龄对《宗镜录》的潜心删述而深刻地影响其“杂于禅”的致思倾向并“为之魁”,对阳明后学的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现出阳明后学向极端化演进的逻辑路径及其背后深层的内在动因与理论依据,对更为清晰地呈现晚明佛学、阳明后学思想演化的历史轨迹,推动儒佛会通思想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三,作为与刘宗周私交甚笃但道不相谋的儒家学者,该书对厘清两人思想差异的细节提供了详实的文本资料。

陶、刘在思想进路以至旨趣的歧异,是学界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这种歧异,多少反映出明清之际儒学所面临的困惑以及儒学者所作的分途多向的理论努力,据姚名达所记刘宗周学术渊源云:

刘宗周之学,推本于周敦颐及二程,而于朱、陆皆有龃龉;得源于王守仁,而为说又异;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切磋于高攀龙、陶奭龄,而其思想迥非高、陶所能和同。^①

仅就陶、刘二人的学术而言,如果说刘宗周的学术“切磋于”“陶奭龄”,而“迥非”“陶所能和同”这种说法还略显委婉的话,刘氏弟子黄宗羲则不惜以战斗的姿态,公开斥责陶氏之学,以极力维护师说为己任:

奋然起曰“是何言与!”乃约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其说。^②

可见当时由于陶、刘二人因学术立场不同所产生的争论之烈,拥趸追随者之间的裂痕之深。该书的发现,为深入研究二人思想之间的细微差别及其内在动因,提供了更为详实的直接文本资料。

总之,陶奭龄是一个在当时思想界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为当今学界所遗忘、埋没的思想家,所著《宗镜录具体》国内无存,也几乎无人关注,其他著述文本资料目前也未见得到系统性的整理,这与其在明末佛教思想史、阳明后学演化史、《宗镜录》抄撮史以至整个儒佛会通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极不相称。以新发现《宗镜录具体》的点校、整理为契机,以《小柴桑喃喃录》、《赐曲园今是堂集》以及《刘宗周全集》等其他散见文献资料为基础,并全面综合利用相关佛教文献和史料,不仅使得对陶奭龄思想的系统性探讨成为可能,也将会推动上述领域整体的系统化研究与细部的深化研究。

(责任编辑:公羽)

^① 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前编·学术渊源》,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十册本)第九册附录三《刘宗周年谱》,第205页。

^② 全祖望《碑铭六·梨州先生神道碑文》,载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鮑琦亭集内编》卷十一,第215页。